



新观察

# 给予批判,也给予更深层次的建设

——我看鲁迅的批评文风

讨论批评的文风,我觉得离不开鲁迅。毫无疑问的是,自从近代以来,鲁迅是一个无法绕开的批评大师。我读鲁迅已经很晚了,但一读之下,仿佛就立刻沉浸在鲁迅的文字世界里,那颗独特的心灵似乎具有强大的磁场,将我的心紧紧地与他的那颗连接在一起跳动。读他的文字越来越多了之后,我才发现他一生中所写下的那些批评文字,之所以到今天还具有那样强大的魅力,正是因为他首先具有一颗极其真诚的心灵。我在他的文字之中始终感觉到一种来自于心灵深处的“热力”,这种力量让所有阅读他的文字的读者,不敢有所懈怠,也不敢有所轻视,更不敢随意敷衍。鲁迅的真诚,首先源于他有一颗敢于直面自我的心灵,这种直面是他正视到了人性自身的弱点和黑暗,由此而进行的一场自我的较量与抵抗,因此他所有的书写,甚至是批评文章,都有对于自身进行的十分严肃甚至是刻薄的审视与批判,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随意地书写那些大而无边、甚至是永远不可言说的话题,他由此也相信一切均有局限,批评者、智慧者、知识者甚至是所谓的英雄都并非万能与高高在上的。正因为敢于直面自我的心灵,才使他的批评文字充满反思、自省、谦卑甚至是虚无的因子,也因此,正如王晓明在《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中所说的,“从他对阿Q们的居高临下的批判当中,我愈益体会到一种身陷愚民重围的不自觉的紧张,一种发现自己的呐喊其实如一箭射入大海并不能激起浪花的悲哀;从他对历代专制统治者的轻蔑背后,我也分明感到一种无能为力痛苦,一种意识到思想和文字远远抵不过屠刀和监狱的沮丧;从他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吕纬甫、魏连尧一类颓唐者的剖析当中,我更看到了他对自己的深刻的失望,对心中那挥赶不去的‘鬼气’的憎恶;从他那强聒不舍的社会斗士的姿态背后,我还看到了深藏的文人习气,看到了他和中国文人精神传统的难以切断的血缘联系”。也正因为如此,鲁迅才会自他的文章《论睁了眼看》中,疾声呼吁人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

鲁迅的心灵,丰富、细腻、敏感、尖锐,他对于自己厌恶或喜爱的事物,从来都毫不掩饰自己心灵的态度,他用一颗饱满的心灵去感悟另外一颗心灵,因此,无论他所批评的对象是怎样地让他愤怒或者热爱,他都从来没有随意地去敷衍,因为他知道他所出击的并非只是自己所面对的这一篇文章、这一个人物、这一件事情,或者这一次让他产生感慨与联想的思想意识,而他的这种真挚、这种热忱、这种恳切,仿佛是“灵魂的一次次冒险”。鲁迅的这种批评的状态,正如学者王乾坤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所总结的:“鲁迅以这样的一个动态的生命,同各种思想遗产和思潮处于复杂的纠缠关系中。他也许不是自觉而为,更没有准备去营造一种体系,而不过是以生命扑过去,在生命之行中感应这个世界给予他的一切。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克服逻辑之弊,以一种整全的方式去领会这个世界,从而把握存在。也正因为如此,他与降身其间的这个世界的各种精神遗产,都处于一种解释学的关系中。”我很喜欢王乾坤用“以生命扑过去”来总结鲁迅的精神状态,因为他的批评文字中所具备的那种“热力”,在我看来,其因缘或许也正在这里。由此,我才发现这种批评的内在秘密,就是在批评之前,自我的灵魂就已经完全与另外一颗灵魂相遇、碰撞甚至是融合或者共同粉粹,因为批评者的内心世界是否足够丰富与强大,决定了他对另外一颗灵魂理解、融合与碰撞的最终结果。鲁迅的“以生命扑过去”,在我看来,就像是一颗灼热燃烧的太阳与另外一颗行星的相遇、碰撞甚至是爆炸,这铸就了他的文

字毕竟要热烈甚至是激烈、热情甚至是激情、深刻甚至是尖刻、开放甚至是毫无奴役与束缚的沸腾。

鲁迅的存在,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一种孤绝的现象,他身上充满了一种敢于正视自我的勇气,而同时他也具备了一种十分少见的批评风骨,那是一种对于一切世界秩序敢于进行怀疑和批判的勇气。我一直以来都以为鲁迅是一个格格不入的精神流亡者,他与现有的秩序从来没有进行过合作,而是从来都以“冷眼”来面对,抵抗一切可能的消解与大儒,他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流亡来表达对现有秩序的不满,来获取心灵的自由。这种对于现有秩序的批判,在复杂的格局之中,分外地艰难。学者王晓明总结这种批判的精神为一种“横站”的人生,作为一个真正的精神界的战士,就必须得做好既要面对来自敌方的攻击,又必须时刻提防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因此王晓明是这样来形容鲁迅的一个人的战争:“可是,你仔细体味一下那横站的含义,想象一下他瞻前顾后的神态,这和绥惠略夫式的绝望的独战,又相差多少呢”?这种绝望的战斗,鲁迅一直持续到他人生的终点,他用自己强大的精神力量坚持了下来,而写作也是他惟一的战斗方式,他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就有这样的叹息:“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话,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因此,他在自己的战斗中才强调“韧”的战斗,才善于短刀见血,才多于嬉笑怒骂,才敢于一意孤行,也才能够向死而生,而在他留下的所有文字当中,不难发现他曾经对于满清政府的愤怒,对于北洋军阀的抵抗,对于国民党统治的讨伐,乃至到晚年他甚至对于自己所倾向的政治立场也产生了怀疑。他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安危与命运而有所顾忌,在他写下文字的那一刻,他的心灵是自由的,他以一种看不到希望的绝望来寻找希望,这种来自生命底色中的力量让我们震撼。

正如我上面所说的,鲁迅是一个孤独的语者,他以自己心灵的自我融化的方式建立了自己的批评生涯,而同时在我以为,鲁迅同样还是一个充满问题意识的学者、一个严谨和严肃的批评大师。尽管鲁迅的一生,留下的学术著作很少,仅仅有《中国小说史略》这样不多的学术经典,他所留下的更多都是或长或短的杂文作品,因此似乎留给后世的印象,便有了如下的特点:鲁迅是一个易怒与率性的批评家,也是一个尖刻与仇恨的破坏者。然而,恰恰相反,鲁迅的确易怒,但并不那么率性;作为批评家,他始终以一种严谨和诚恳的态度作为自己写作的出发点,他虽然很少如胡适或者傅斯年那样将文章当成具有严密体系的学术文章来写作,而是将自己的研究融汇成为文学性的语言,更让人吃惊的是,他的那些批评性质的杂文作品或者文艺评论作品的背后,是他多少年苦心积累和沉淀而成的思想成果,因此,他从来不随意进行发言。在他文章之中,更多的是自己苦心孤诣的研究成果,诸如他曾经被邀请去给黄埔军校的军人进行演讲,但他并没有随意地进行自己非专长领域的发言,而是给在场的听众留下了被人们称赞的学术文章《革命时代的文学》,这篇文章是一篇演讲稿,也是一篇散文与杂文作品。鲁迅的意义在于他从来不平性,满足自己内心的一时快感,因此他留下的所有文字,似乎都掩藏着一个巨大的精神世界,可以让我们随意找到一个原点,然后不断地向下进行挖掘,因为那下面从来都不是虚空与无物的废话。鲁迅的严谨源于他的勤奋与广博,他的一生除去写作,大多数时间都用来买书、读书和翻译外国文学,直到晚年他还时刻关注着自己所批评对象的领域,而对于鲁迅在创作中的才气,作为五四时期风云人物的胡适曾这样评价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

## ■经典话语

“白描”却没有秘诀。如果说有,也不过是和障眼法反一调: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而已。

《南腔北调集·作文秘诀》,《鲁迅全集》第4卷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

议论是有的,但大抵是唱高调,其实唱高调就是官僚主义。

《鲁迅书信集》

八股无论新旧,都在扫荡之列,我是已经说过了;孔拜五,六派有新入股性,其余的人也会有新入股性。例如只会“辱骂”“恐吓”甚至于“判断”,而不肯具体地切实地运用科学所求得的公式,去解释每天的新的事实,新的现象,而只抄一通公式,往一切事实上乱凑,这也是一种入股。即使明明是你理直,也会弄得读者疑心你空虚,疑心你已经不能答辨,只剩得“国骂”了。

《伪自由书·透底(回信)》,《鲁迅全集》第5卷

高。豫才兼有鉴赏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鉴赏力虽佳,创作较少。”因此,在我看来,鲁迅的文字是严肃的,又是活泼的;是严谨的,又是艺术的;是厚实的,又是洒脱的。

认为鲁迅是破坏者,是对鲁迅更大的误解。批评并非是破坏,而是更深层次的建设,否则批评既无意义也显得虚无;鲁迅也充满了深刻的绝望感,但他的绝望却是建立在内心的希望之上的,因此他所有的批评文字之所以还让人感到不那么绝望与痛苦,是因为他让读者清醒和自由之后,自我去寻找新的出路,而并非是没有路可走的无望。也因此,他总会试图寻找自己的答案,他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强调“立人”的思想,正是开启了五四以来对于国民进行启蒙的序幕,而这难道不是一种让人赞叹的建设性的思维吗?鲁迅的确有过尖刻,但并非是仇恨的哲学家,因为他内心遭遇到太多时代的苦难,使他愤怒甚至是为离愤怒地尖刻,但他尖刻的背后却是试图挽救与启蒙的爱意,他以猛药下给病重的对象,而仇恨永远不属于他自己,因为爱是他写作的起点。大爱让他舍弃了曾经拥有的理想与生活,才选择了这样一条看不到希望的坎坷道路,因此,他的立场是建设者的批评,而不是简单的仇恨哲学,或尖刻地满足自己私欲的快感,更不是获取世俗声名与利益的交换。因此,读过鲁迅,我才感觉到,优良的批评文风不是简单地破坏,也不是简单地建设,而是更深层次地认识到必须要回到生命与事物根本的起点,寻找一切可能的出发点,给予批判,也给予建设,这才是批评本身所需要的风范。我以为鲁迅的文字是充满希望与悲悯情怀的,因为那其中充满了真正人间大爱的胸怀与气魄,也充满了真正富有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的力量。

## “倡导优良批评文风”笔谈(七)

### ■评 论

## 地方知识的文学书写

——读刘春龙《乡村捕钧散记》 □费振钟

刘春龙这部以渔为专题的散文集,主要写作于3年前,结集在去年冬天。99篇,记99种渔事。渔的方式到底有多少种,我不知道,但即使在我们兴化地区,如果网罗起来也肯定超过这个数目。作者只写99种,应该是他最熟悉最亲切的经验。仅此而言,亦已经蔚然可观。

兴化是里下河地区中腹一块洼地,由于泻湖的水性影响,境内由北向南,水泊密布,河流纵横。这样的地形,形成了兴化历史悠久的渔业群体,在宽泛的民族志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看做依水为生的特殊族群。显而易见,由于渔业劳动优先于农耕而成为更早的生产方式,这一地区渔的知识也更古老和更丰富。兴化作为农业大县是后来的事,即便到“以粮为纲”的上世纪70年代,渔业仍然在这个地区占有较大比例。如果有人需要研究中国南方地区渔的历史和文化,兴化无疑可以提供可靠丰富的地缘资料。但刘春龙的写作非为这一专业目的。春龙自己是兴化渔民后代,19岁之前甚至还做过渔业生产队的技术员。这个身份让他作为渔业劳动的传承人,自觉具备了一种独特的知识立场。与一般的知识性作品不同,春龙有关渔事的描述,尽管时有经典诠释,以及名词考证,但主要还是“劳者歌其事”式的写作。也就是说,他不仅对所有那些渔事有着个体亲历,而且里面包含了更重要的劳动态度和情感,以及由此情感和态度透析出来的生活观念与价值内涵。这就将他的《乡村捕钧散记》既与传统上那种“兼赅物理”的纯知识写作,又与文人隐喻性的“渔歌”理想区别开来了。

《张小钧》写一种简单的捕鱼方法,从

做钧、挽钧到收钧,作者顺次写来,最后却集中到张钧渔人的身形和神情:“张钧的渔人大都是罗圈腿,又称蝎蝎腿,背也微驼,那是日积月累盘腿弯腰‘挽钧’造成的”,“满脸沧桑的渔人,似乎漠然地看着我,有如罗中卜那幅叫《父亲》的油画”。《鲍翁》叙述大型“围渔”,而视点则集中在罩鱼的女人:“她们提着鱼罩,每走几步,就把罩握下,双脚在罩里搅动,发觉有鱼,就用脚踩上来,不管多大的鱼,也不管什么品种的鱼,哪怕是鳊鱼、昂鳙,从没见过她们用手捉过”。

《铲网》中捕鱼的一对未成年的小兄妹,是如此孤单,又如此相依依恋:“这样的渔事未免单调乏味,可兄妹俩做得认真而投入,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生活,祖传辈辈传下来的生活。要收工回家了,哥哥袒过妹妹手中的双桨,妹妹起初不让,哥哥沉下脸了,妹妹只好坐到船梁上,弯腰捡去船里的杂物。”所有这些都在知识之外,却又让有关“渔”的叙事具备了人生的深度,使这部散文的知识描述指向生存的真实。

但《乡村捕钧散记》的写作,还不限此文学一义。“渔”是什么意思?这是作者用此集作品反复追寻的一个隐暗问题。30年后,当作者离开少年身历的这一段劳动的历史,对他的祖祖辈辈所从事的捕鱼生活,为什么怀有如此热切的解读,以至要以“知识考古”深究细释各种渔事活动,就不是“散记”二字所能彰明的了。刘春龙书中说,“我们找寻的仅仅是逝去的渔事记忆吗?”显然,作者表达了他对于“渔”的另类意义的渴求,而此渴求则来源于一种原生情感以及由这种原生情感引发的文化冲动。他对“渔”的意义的寻找,可以说是一种

本能的寻找。当兴化地区历史上那样一个以渔业为生的水上族群,给定了作者一种假定的血缘社会关系后,“渔”的知识问题,就产生于对这个族群的情感识别与身份认同之中。因此,作者实际上通过有关“渔”的知识与知识的叙述,维系着他与自身所依附的族群的纽带,或者说“渔”的知识,在刘春龙那里其实正是纽带本身。《乡村捕钧散记》对作者的重要性也即在于,通过这条纽带的连接、输取文化的原生力和内聚力,以对抗当今这个文化涣散、混乱和迷失的时代。而作者后记中所孜孜谋求、溢于言表的“文化高度”,并非空泛之谈,是有着确切的经验依循和目标指涉的。即便仅仅限于一块小地方,然而这样的文化内聚力,至少让作者和读者获得了一定的自信心。

因此之故,读者也就有了把《乡村捕钧散记》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和环境看待的可能。春龙的写作,无疑属于纯粹地域性质下的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书写。关于全球化 and 普遍主义与地方和地方性知识的冲突,已为不少文化 and 政治研究之士屡多提出,重建地方性知识也成为较高的呼声。一个地区的社会认同,在诸种传统文化因素中,特别需要依赖该地区的知识存量加以维持。而现实情况却表明,地方性知识随全球化带来的普遍主义的冲击越来越小,越来越薄弱。地方性知识缺失在最近10年来加快的结果,带来了地区社会认同力下降的深层社会文化危机。应对这一危机的方略,到底哪些是有效的,现在还不清楚。无论怎么说,今天作者以地方性知识的记录与书写,凸显其“地方”价值,以之介入当下社会和文化危机中,较之学理研究,或许提供了更多的想象和可能性。如果情况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未来的“希望”仍然存在乎“地方”,那么应该说刘春龙的《乡村捕钧散记》,适逢其时也恰如其分地在此“希望”上添加了一道光芒。14世纪兴化县志说,这个区域“水势环绕,风气之秀,发为人文科目之盛”,似已确认“地方”的功能,刘春龙要做的事,也许就是继续通过自己的写作发扬兴化传统。

周航

## 「打工文学」的再思考

### ■关 注

“打工文学”从上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有20余年。它经历过原生态的存在与发展,呈现出一个从被忽略与边缘化到逐渐被重视并研究的客观过程。当它重新被发现,其意义就因这种“发现”而被赋予某种独特的意义,就有了人文价值与美学衡量。如果这个念头符合事物发展的逻辑,随之我们难免要问,它是在怎样的环境中诞生的?它诞生之后经历过怎样的命运?它与其他品种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有何异同?初识它的人是仁足凝视还是擦肩而过?等等。它的存在已成事实,它的令人注目也已摆在眼前,在这样的前提下,评论界对它的存在采取何种态度将成为评估它存在(或存在过?)的价值的关键。作为中国当代一种精神支流的文化与文学现象,它终究会有一定的延续性、传承性与影响力。如果它仍然在生长的过程中,作为批评者就更没理由弃之而不顾。退一步讲,即使它已成昨日黄花,可对之重新梳理与研究也具有相当的价值,必为日后研究20世纪末至今20余年中国社会与文化转型历程中的精神与文化史的考察提供重要文本资源。

诚然,“打工文学”本身命名的合理性仍存在诸多争议。但这并不是关键,命名只是确立一个符号。符号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符号之下的现象及其可能生成的意义。所以,评论界不必停留在命名问题上争执不休。姑且就叫它“打工文学”又如何?有些学院派“正统”或主流的批评家对“打工文学”的研究不屑一顾。他们关注的是所谓的学术含金量,痴迷于少数重点作家作品的炒来炒去,青睐从故纸堆中淘出无数的现成文字并去堆砌学术的象牙塔,而对眼下的文学与文化现象漠然视之。其理由大概是认为“打工文学”的研究没有历史距离感,只会停留在表层吵吵嚷嚷,甚至认为这一研究是在给那些“卑贱者”的文学发流通行证,是在给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盲流们”(进城务工人员)树碑立传,或者是指责研究者容忍将数以千万计“卑贱者”们的生活写照去践踏优雅的文学殿堂。明眼人可能明白,现在的学术风气扶持了大量数学院派研究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逃离现实、脱离社会、缺乏社会责任感的表现,再说明白一点,是担心对自身的学术建构不利。因为去研究有待争议甚至是身份不明的一种文学与文化现象,将会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并难以认定对研究者的学术成果。这或许是另一种“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的交锋吧,说到底,这是一种自私的表现,是一种缺乏开创勇气与学术短视的行为。

“打工文学”研究者也需要必要的反思。其本身的成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有“打工文学”自身复杂性的原因,同时,也呈现出这方面研究捉襟见肘的窘态。比如,对“打工文学”的界定至今都难成定论。只要是打工者写的就是“打工文学”?只要是写打工者的就是“打工文学”?现在就是一个“打工”时代,那么一切与此相关的文学都是“打工文学”了?含混之余的结果是,“打工文学”要么不被重视,要么将其泛化到无边无际的地步,要么是从不重视到区域性、时段性的重视,总之是一种不痛不痒的游离摇摆状态。中国新时期以来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思潮更迭频繁,去明确界定“打工文学”确实存在一定困难,但这是研究的起点,马虎不得。如果一味地只是在做界定的外围工作,“打工文学”的研究终难取得进展。这一弊端已成为“打工文学”研究的一种阻碍,值得深思。同时,这种界定工作也有迫不及待要给“打工文学”作文学史定位的急功近利的嫌疑。

从而,“打工文学”研究又怎么被手执话语权柄的主流批评界所摒弃,要么成为那些鼓捣“打工文学”者们的自唱自戏的寂寞自恋。平心而论,主流批评对“打工文学”现象的忽视,确实是一种缺乏才气与勇气的表现;另一方面,随着改革与市场经济体的深入发展,文学日益边缘化也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主流文坛的地位都面临着尴尬的处境,那么打工文学又何必急欲登堂入室以求写进文学史呢?所以,笔者认为,主流批评界的话语释放与“打工文学”文学史定位都还有待去做更为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打工文学”研究方兴未艾。然而,与此相关的研究,更多的是对“打工”的研究,对其中“文学”的关注却大有憾缺。大多数研究只是将之置于社会转型背景之下,对其进行相关社会学、人类学层面的考察,并理所当然地以文化研究作为切入点与视角,从而对“打工文学”作宏观的审视。这种研究本身就含有对“打工文学”的几分否定。所以,如果真要确立“打工文学”的文学史地位,超越目前“打工文学”研究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文化视角的层面则是当务之急。这不仅需要批评家们对“打工文学”的文学性做足关注与努力,在理论上正确引证“打工文学”的良性发展,还需要“打工文学”作家们自身的理论建构与创作实践的跟进。一句话,就是要努力提高“打工文学”文学性的开掘与审美特质的探求。无论是“打工文学”作家还是“打工文学”研究者,必须反思“打工文学”,不要带着“席勒式”的眼光来要求与看待“打工文学”。研究到最后的最终结果是,“打工文学”将会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品种,而不仅仅被看做社会学研究的旁门文本;“打工文学”中的人物也不会莫名不成成为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的“他者”形象。以后的研究,如果偏重“文学性”而不是一味紧盯“打工”,那么“打工文学”或许会有另一番前途,也不至于沦为众口一词的中国转型期的“底层”风景。

■新作快评 迟子建《七十年代的四季歌》,《上海文学》2011年第1期

## 政治年代里的人间滋味

□许 艺

以外祖母、祖父、母亲和父亲两代人为中心写就的《七十年代的四季歌》,是女作家迟子建的短篇新作。小说以春夏秋冬四季划分章节,每个季节讲述一个人物及与此季节有关的生活故事。在四位主要人物之外,又辅以苏联老太太、春生、张瓦匠、老蓝、哑巴等外国人物,片段化地展示了上世纪70年代中国北方普通百姓的生活图景。

迟子建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作家,都有通向自己作品的‘隐秘通道’。如果说我说出我作品的‘隐秘通道’,那就是大自然”。大兴安岭的壮阔苍茫和黑土地上生活的人们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坚实的根基,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让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思索的作家感到踏实的了。当代文学不是没有过宏大,不是没有过私人,却少有人像迟子建这样,多年来如一位安静的“打草人”的,一刀一刀收割大地上最普遍真实的悲喜。诗意与温情是读者从迟子建作品中获得的最基本的阅读体验,当写作步入成熟,人世经验亦趋于丰厚的女作家又一次在小说里写到自己的家人时,将会是怎样的情形呢?

土地横加上四季的纵,于是有了悲喜交加的人世。作家以闲散的笔调和淡远温情的回忆将小说从抽象的意义那里夺回来,重新还给热气氤氲的生活。上世纪70年代一直蜷缩在历史的重重帷幔之下,无论是为其鞍前马后奔忙不已的作品,还是振聋发聩控诉其所造成的伤害的作品,似乎都很难从根本上挣脱时代话语的半径而画出新的圆周。站到另一个角度看来,特殊年代里文学话语的蜷缩姿态本身或可最生动地说明这是一个多么深广的半径,但近年来作家们重新表现出用的图景至少让我们欣喜地看到,无法反抗这个半径的时候,似乎还可以寻觅不同的圆心。前瞻与反顾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的,常顾而能常新的理由很大程度上在于流转的时间为一次次反的反复撤换着不同的平台,与此相伴的则是一

遍遍被岁月涤荡过的回望的眼神。作品中的小女孩迎灯全然不知外祖父所说的“政治上有问题”为何物,只是知道苏联老太太炒的蚕豆酥香可口,于是轻松跨越了木栅栏坐在高背椅子上吃蚕豆,在屋中的空地上和老太太跳舞。当老太太故去时,她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在小孩子的点点目光中,“七十年代”身上厚厚的政治大衣滑落了,一个比政治更悠长的、有人间滋味的“七十年代”逐步呈现。淡去的终将会淡去,而外祖母炉灶里金红橘黄的火焰将成为“我”童年记忆的底色,伴着松木样子的香气一直温暖着“我”。

祖父能侍弄出一流的菜园子,也会将家雀摔死在鸟屋烤了吃;暴烈的他会扛着斧子来砸“我”家的门,也会在儿子落魄的时候提着青菜去邻居家打听他的境况。祖父的叫骂让迎灯感到羞耻,路上遇到了祖父也会绕着走,但祖父的菜园子和菜园里的鸟儿却是诱人的。“叫油子在眼里,是个不折不扣的叛徒”。一个生活在上世纪70年代的儿童既抵挡不了口腹之欲去苏联老太太大吃蚕豆,却也会将带有诱捕性的小鸟叫油子毫不犹豫地称作“叛徒”。类似“叛徒”这样带有政治宣判色彩的词语在儿童的语言中自由地浮现,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它不仅折射出在特定话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儿童话语选择上隐秘的被动性,同时也无意中记录了时代怎样以话语的形式微妙地参与着个体的成长与生活。

在母亲和父亲的故事里,他们的命运与时代更紧密了。然而,无论是讲述父母受到的政治冲击,还是他们因此而产生的身体、心理创伤,更多流泻于笔端的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怀,是对留在岁月里的亲人的言行的亲近。不管是厌倦了前妻的血泪控诉,还是对于这控诉本身价值和结果的质疑,作家们对那一段往事的重新书写都无疑是在为那个年代洗尘(抑或是洗除浓重的油彩),他们的写作让时代与生活真相的呈现具有了某种新的可能。